

## 老龄化与养老问题研究(三)

# 延迟退休年龄对中国城镇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林 宝<sup>1,2</sup>

(1.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老年与家庭研究中心, 北京 100732)

**摘 要:** 延迟退休年龄已经势在必行。文本基于两个方案测算了延迟退休年龄对城镇劳动参与率、城镇工作年龄人口、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等的影响。测算表明, 延迟退休年龄可有效提高劳动参与率, 增加城镇劳动力供给。延迟退休年龄将使中国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的高峰延迟近20年。

**关键词:** 延迟退休年龄; 劳动力供给; 劳动参与率; 经济活动人口

**中图分类号:** F241.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245(2018)03-0111-08

**DOI:** 10.14100/j.cnki.65-1039/g4.20171205.004

随着中国人口结构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变化, 法定退休年龄改革势在必行, 这既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需要, 也是充分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的需要, 是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林宝, 2013)。2013年11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 要“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2015年10月,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一步提出要在“十三五”期间“出台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显然, 延迟退休年龄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

法定退休年龄一般是指人们可以退出劳动岗位且能足额领取养老金的年龄, 所以延迟退休年龄一方面会对社会保障制度产生重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也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一定的冲击。笔者曾专门撰文分析了延迟退休年龄对养老金隐性债务(林宝, 2003)和资金平衡(林宝, 2014)的影响, 这里试图分析延迟退休年龄对城镇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实际上, 一些研究已经注意到延迟退休年龄对中国劳

动力市场的长期和短期影响(杨贞贞等, 2010; 刘妮娜、刘诚, 2014; 刘琛, 2015)。但是, 当前还缺乏研究成果结合具体方案来分析延迟退休年龄对中国劳动力供给的长期影响。为此, 本文特以两个延迟退休年龄的具体方案为基础, 结合以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的长期人口预测结果, 分析延迟退休年龄对中国未来城镇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 一、退休年龄与劳动力供给

退休制度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 是人类社会在迈向工业化社会的过程中产生的。退休制度从其产生的那一刻起, 就开始对劳动力市场产生重要影响。法定退休年龄是退休制度的重要内容。早期关于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定多具有一定的强制性, 要求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离开工作岗位, 尽管其中部分人会回到劳动力市场, 但绝大部分人会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离开劳动力市场, 不再寻求就业机会; 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 退休年龄规定也逐渐人性化, 弹性退休年龄逐渐被一些国家所引入, 允许人们在法

收稿日期: 2017-08-30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养老服务业务发展研究(RKSCX2017010)、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老龄化和城市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林宝,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与家庭研究中心研究员。

定退休年龄一定范围内退休,但退休年龄与养老金待遇相挂钩。弹性退休年龄虽然强制性减弱,但仍然对人们的退休有一定的引导性作用,因此大多数人会在法定退休年龄附近一定区间内退休并最终退出劳动力市场。法定退休年龄对劳动力供给的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在法定退休年龄附近人们的劳动参与率会出现较快下降,有的甚至出现断崖式的下降。

以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为例,目前只有以色列和瑞士的女性法定退休年龄为 64 岁,其他国家的男性和女性法定退休年龄已经达到 65 岁或以上,冰岛和挪威的法定退休年龄甚至达到了 67 岁(OECD, 2013)。分析 OECD 国家的分年龄劳动参与率可以发现,在法定退休年龄附近的年龄组劳动参与率下降最快。2014 年,OECD 国家平均的劳动参与率在 55-59 岁年龄组还高达 70.72%,但到 60-64 岁年龄组则迅速下降至 49.12%,到 65-69 岁年龄组则进一步下降至 25.03%,到 70-74 岁年龄组则降至 14.55%,即在这几个年龄组劳动参与率下降了 56.17 个百分点。男性和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变化表现出相同的趋势,在 55-59 岁年龄组,男性劳动参与率还高达 80.06%,女性劳动参与率为 61.80%;但到 70-74 岁年龄组,男性和女性劳动参与率分别仅为 19.36% 和 10.44%。也就是说,男性和女性劳动参与率分别在这几个年龄组下降了 60.70 和 51.36 个百分点(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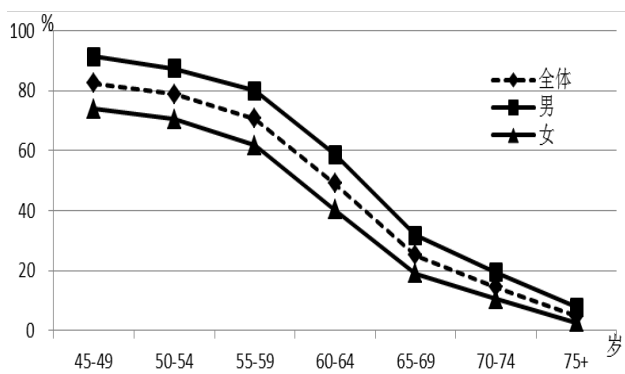


图1 2014年OECD国家分年龄劳动参与率

资料来源: OECD(2015)。

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比 OECD 国家还早,所以劳动生产率快速下降的年龄组更早,这一点在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上体现得更为明显。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结果分析,中国城镇男性分年龄劳动参与率从 59 到 60 岁出现了较大的下滑,下降幅度高达 19.23 个百分点,城镇女性分年龄劳动参与率从

49 到 50 岁出现了较大下滑,下降幅度高达 15.94 个百分点,均远远高于其他年龄劳动参与率的变化(见图 2),此外女性从 54 到 55 岁劳动参与率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下降幅度为 5.67 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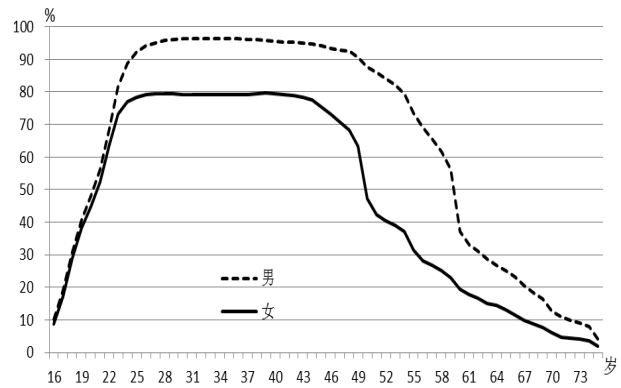


图2 2010年中国城镇分性别分年龄劳动参与率

资料来源: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

也明显高于相邻年龄的劳动参与率下降幅度。这一现象的产生与退休年龄的规定密切相关。众所周知,中国男性的法定退休年龄为 60 周岁,女工人的法定退休年龄为 50 周岁,女干部的法定退休年龄为 55 周岁。这些年龄劳动参与率的大幅下滑与退休年龄规定刚好吻合,显然,很大部分劳动力退出劳动力市场是因为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

以此分析,延迟退休年龄将延长人们的工作年限,扩大退休年龄以下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由于在原退休年龄到新退休年龄之间不再有强制性退休要求,在原有制度下因强制退休而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在新的退休年龄下,将会继续留在劳动力市场,因而延迟退休将有效提高这个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

## 二、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

由于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设计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社会保障制度和就业形势、统筹兼顾不同群体利益、统筹兼顾短期和长期影响等基本原则(林宝, 2014)。因此,渐进式改革成为延迟退休年龄的必然选择。关于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笔者于 2001 年曾提出过一个推荐方案:2015 年以前把女性退休年龄统一为 55 岁,从 2015 年开始,男性的退休年龄每 6 年提高 1 岁,女性的退休年龄每 3 年提高 1 岁,到 2045 年将男女退休年龄同时提高至 65 岁。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其他方案,如高庆波、邓汉(2009)

提出从2010年开始,女性退休年龄每年调整3个月,女工人到2050年,女干部到2030年,逐步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0岁;范围(2011)提出在2015-2030年间,男性每3年提高1岁,女性每2年提高1岁,分别将男性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女性退休年龄提高到62.5岁;穆怀忠、柳瑞清(2011)也提出了三个方案,即:方案1是从2015年开始,女职工每1年延迟1岁,女干部每2年延迟1岁。至2025年,女职工延迟到60岁退休。2025年开始,男女职工同时每2年延迟1岁,至2034年延迟到65岁退休;方案2是从2015到2025年,女工人延迟到55岁,女干部延迟到60岁,实行弹性退休。2025到2035年,男女职工均延迟到65岁,实行弹性退休。2035年开始,男女职工退休年龄均为65岁;方案3是从2015年开始女工人每2年延迟1岁,干部每3年延迟1岁。从2020年起,男职工每5年延迟1岁,至2045年起男女退休年龄均延迟至65岁。

这些方案基本都采用了渐进式的改革方式,改革开始的时机多选择在2015年左右。但根据近年来的种种迹象,延迟退休年龄方案出台在即,但延迟开始当在5年之后(侯利军等,2015)。因此,这里采用两个延迟退休年龄方案:

方案1(慢方案):以笔者(2001年)提出的方案为基础,将改革基年从2015年延后5年至2020年,将开始年份调整为2021年,在此之前女性退休年龄统一为55岁,仍然保持男性每6年延迟1岁,女性每3年延迟1岁,到2050年男女双方同时达到65岁。

方案2(快方案):考虑到方案1周期较长,在起始年份延后的情形下,可能显得过慢,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因此,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快方案。同样是以2020年为基年,以2021年为开始实施年,但延迟的节奏适当加快,女性退休年龄在此之前统一为55周岁。男性每4年延迟1岁,女性每2年延迟1岁,男性和女性在2040年同时延迟至65岁。

两个方案具体实施时均按月推进,即每6年延1岁实际是按照每6个月延1个月实施,每4年延1岁实际上是按照每4个月延1个月来实施。

### 三、延迟退休年龄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一)延迟退休年龄对劳动参与率影响的估计方法  
正因为退休对劳动参与率有显著的影响,所以

当退休年龄延迟时,劳动参与率的断崖式下跌将发生在新的退休年龄,原退休年龄的劳动参与率势必会提高。且随着退休年龄逐渐延迟,劳动参与率发生断崖式下跌的年龄也将逐渐延后。所以,要正确估计延迟退休年龄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首先必须估计原退休年龄到新退休年龄之间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在这里,我们假定当某一个年龄不是退休年龄时,其劳动参与率随年龄上升而变化的幅度保持基本稳定,即劳动参与率变化幅度(以该年龄劳动参与率减去上一个年龄劳动参与率)应与相邻年龄的劳动参与率变化幅度接近。因此,我们取上一年度前后各三个年龄的劳动参与率变化值的平均数作为原退休年龄劳动参与率变化幅度的估计值。当新的退休年龄为整数年龄(如61岁)时,可用公式表示如下:

$$\Delta R_{t,ora} = (\Delta R_{t-1,ora-3} + \Delta R_{t-1,ora-2} + \Delta R_{t-1,ora-1} + \Delta R_{t-1,ora+1} + \Delta R_{t-1,ora+2} + \Delta R_{t-1,ora+3}) / 6 \quad (1)$$

其中 $\Delta R_{t,ora}$ ,表示原退休年龄人口在第 $t$ 年时劳动参与率与上一个年龄劳动参与率相比的变化值。 $\Delta R_{t-1,ora-1}$ 、 $\Delta R_{t-1,ora-2}$ 、 $\Delta R_{t-1,ora-3}$ 分别表示比原退休年龄低1、2、3岁的三个年龄在第 $t-1$ 年的劳动参与率变化值。 $\Delta R_{t-1,ora+1}$ 、 $\Delta R_{t-1,ora+2}$ 、 $\Delta R_{t-1,ora+3}$ 分别表示比原退休年龄高1、2、3岁的三个年龄人口在第 $t-1$ 年的劳动参与率变化值。则第 $t$ 年原退休年龄的劳动参与率为:

$$R_{t,ora} = R_{t,ora-1} + \Delta R_{t,ora} \quad (2)$$

其中, $R_{t,ora}$ 为原退休年龄在第 $t$ 年的劳动参与率。 $R_{t,ora-1}$ 是比原退休年龄低1岁所在年龄的劳动参与率。

举例来说,当退休年龄提高至61岁时,上一个退休年龄60岁的劳动参与率变化值等于上一年57、58、59、61、62、63等六个年龄劳动参与率较上一年龄劳动参与率的平均降幅。而此时60岁的劳动参与率则等于59岁的劳动参与率加上上述六个年龄劳动参与率的平均降幅。

当新的退休年龄为非整数年龄(如60.33岁)时,劳动参与率的估计需要根据退休年龄增加值对当年变化值作相应分解。按照以下程序计算:

首先,按照公式(1)(2)计算出原退休年龄不受退休事件影响时的劳动参与率。然后以该劳动参与率减去第 $t$ 年比原退休年龄大1岁所在年龄



的劳动参与率, 得到两个年龄参与率之差, 即为如果延迟 1 整岁时的劳动参与率变化值。用公式表示为:

$$\Delta R'_{t,ora+1} = R_{t,ora+1} - R'_{t,ora} \quad (3)$$

其中,  $R'_{t,ora}$  为按照延迟 1 岁根据 (1)(2) 式计算出的第  $t$  年原退休年龄的劳动参与率,  $R_{t,ora+1}$  为第  $t$  年比原退休年龄高 1 岁所在年龄的劳动参与率。

其次, 对按照非整数渐进式延迟时劳动参与率变化进行估计, 具体方法是以第一步计算出的延迟 1 岁时的变化值乘以退休年龄的实际变化。用公式表示为:

$$\Delta R_{t,ora+1} = (nra - ora)\Delta R'_{t,ora+1} = (nra - ora)(R_{t,ora+1} - R'_{t,ora}) \quad (4)$$

其中,  $\Delta R_{t,ora+1}$  为第  $t$  年比原退休年龄高 1 岁所在年龄的劳动参与率的真实降幅。 $nra$  为新退休年龄 (非整数年龄, 如 60.33 岁),  $ora$  为原退休年龄 (取整数年龄, 如 60 岁)。当退休年龄按照 3 年延迟 1 岁时, 则原退休年龄在后三年劳动参与率的变化, 分别是前后各三个年龄劳动参与率平均降幅的 1/3, 2/3 和 1。两年延迟 1 岁、4 年延迟 1 岁、6 年延迟 1 岁以此类推。

最后, 可计算出第  $t$  年原退休年龄的劳动参与率。具体计算方法:

$$R_{t,ora} = R_{t,ora+1} - \Delta R_{t,ora+1} \quad (5)$$

由此, 可以得出退休年龄延迟后各年龄的劳动参与率, 将之与延迟退休之前的各年龄劳动参与率进行比较, 就可以看出延迟退休年龄对分年龄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在计算出分年龄劳动参与率之后, 还可估计对总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R_t^T = \frac{P_{t,16+}^E}{P_{t,16+}^T} = \frac{\sum_{i=16}^{100} P_{t,i} \cdot R_{t,i}}{\sum_{i=16}^{100} P_{t,i}} \quad (6)$$

其中,  $R_t^T$  为第  $t$  年总劳动参与率,  $P_{t,16+}^E$  为第  $t$  年 16 岁及以上人口,  $P_{t,16+}^T$  为第  $t$  年 16 岁及以上经济活动人口,  $P_{t,i}$  为第  $t$  年  $i$  岁年龄人口,  $R_{t,i}$  为第  $t$  年  $i$  岁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

## (二) 延迟退休年龄对城镇劳动参与率影响的估计结果

根据我们的延迟退休年龄方案的具体设计, 女性退休年龄在 2020 年统一为 55 岁, 因此在此之前 50-54 岁的劳动参与率将不受退休年龄的影响, 这一年龄组的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在 2020 年完成。根据式 (1)(2) 测算, 在女性退休年龄统一为 55 岁后, 50-54 岁城镇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将比不延迟时上升 12.92 个百分点, 54 岁女性劳动参与率将提高至 50.09%。

从 2021 年开始, 由于退休年龄逐渐延迟, 60-64 岁男性和 55-64 岁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将逐渐受延迟退休年龄的影响。根据式 (1)-(5) 测算, 在延迟方案情况下, 所涉及的年龄段劳动参与率将明显上升。在方案 1 中, 由于延迟退休年龄的节奏较慢, 到 2050 年才完成整个延迟过程; 方案 2 则较快, 在 2040 年完成延迟退休年龄过程。延迟退休年龄对各年龄劳动参与率的影响也分别在 2050 年和 2040 年完全呈现出来, 当延迟退休完成时, 60-64 岁男性各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将较不延迟时上升的幅度在 14.96-16.50 个百分点之间 (见图 3、图 4)。55-64 岁女性各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将较不延迟时上升的幅度在 16.33-18.16 个百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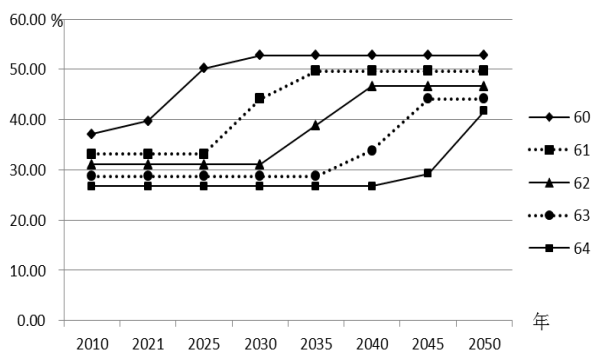


图3 方案1下男性60-64岁劳动参与率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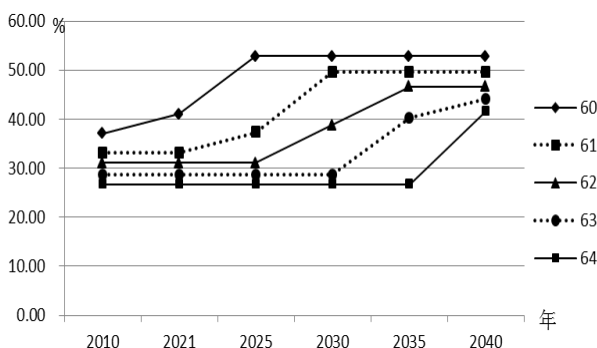


图4 方案2下男性60-64岁劳动参与率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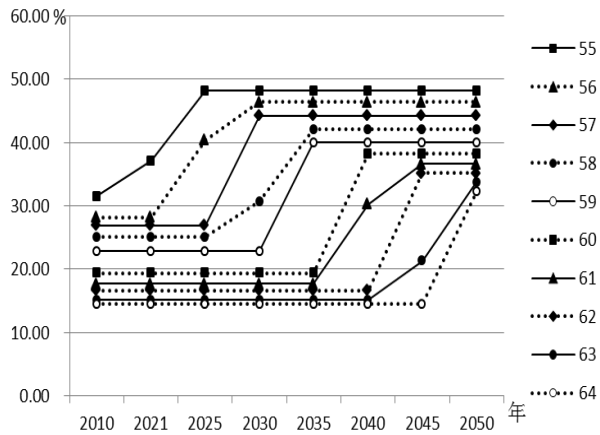


图5 方案1下女性55-64岁劳动参与率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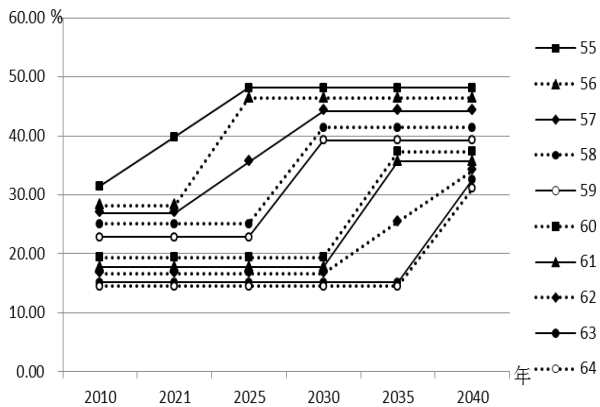


图6 方案2下女性55-64岁劳动参与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测算结果。

点之间（见图5、图6）。但是，应该注意的是，由于采用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因此，劳动参与率

的提升也具有渐进性的特点，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受延迟退休影响的年龄人口逐渐增多；二是各年龄的劳动参与率是逐渐提高的，根据延迟退休年龄的节奏，在各年龄完成劳动参与率提高的过程历时在2-6年之间。在方案1中，男女各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分别历时6年和3年；在方案2中男女各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分别历时4年和2年。

延迟退休年龄导致的部分年龄劳动参与率提高将最终导致总劳动参与率的提高。根据公式（5）可计算不同年份男、女及男女合计的劳动参与率。在假定其他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年龄模式分布不变、受延迟退休年龄影响的年龄段按照估计趋势变化的情况下，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劳动参与率呈下降趋势。在不延迟退休年龄的情况下，男性劳动参与率将从2016年的74.85%下降至2050年的56.97%，女性劳动参与率将从2016年的55.56%下降至2050年的36.71%，男女合计的总劳动参与率则将从2016年的63.35%下降至2050年的46.92%。延迟退休年龄时劳动参与率将较不延迟时逐渐提高。在按照方案1、方案2延迟退休年龄时，2021年，总劳动参与率分别为63.59%和63.62%，分别较不延迟上升约0.71和0.74个百分点；2035年，总劳动参与率分别为53.96%和54.53%，分别较不延迟时上升1.71和2.58个百分点；2050年，由于延迟退休年龄均已完成，两个方案的劳动参与率趋于一致，均为49.84%，较不延迟上升2.92个百分点。男性和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表现出类似的趋势（见表1）。

表1 延迟退休年龄对总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单位：%

年份	合计			男			女		
	不延迟	方案1	方案2	不延迟	方案1	方案2	不延迟	方案1	方案2
2020	63.52	63.52	63.52	73.56	73.56	73.56	53.18	53.18	53.18
2025	59.97	61.02	61.22	70.25	70.48	70.59	49.38	51.28	51.56
2030	55.84	57.23	57.61	65.86	66.37	66.62	45.50	47.81	48.33
2035	52.25	53.96	54.53	62.12	62.87	63.22	42.08	44.77	45.57
2040	50.21	52.37	53.03	60.50	61.37	61.79	39.64	43.12	44.02
2045	48.42	51.03	51.32	58.87	60.01	60.21	37.74	41.84	42.23
2050	46.92	49.84	49.84	56.97	58.59	58.59	36.71	40.94	40.94

资料来源：测算结果。

#### 四、延迟退休年龄对城镇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要测算延迟退休年龄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在已知分年龄劳动参与率的情况下，还需要各年的分年龄人口数。这里，我们通过人口预测得到。人口预测期限为2010-2050年，采用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开发的PADIS-INT人口预测软件进行预测。以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参考近年来总人口、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城镇化率等参数变化；生育水平考虑到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的影响，总和生育率2016-2020年分别为1.65, 1.8, 1.8, 1.8, 1.65, 2021年后回落至1.60并保持不变；人口预期寿命非线性增长至2050年男性78.77岁，女性83.67岁；死亡模式采用联合国远东模型生命表；城乡迁移2020年以前为每年1000万，2021-2030年为800万人，以此类推，此后每10年减少200万人。

##### （一）延迟退休年龄对城镇工作年龄人口的影响

工作年龄人口是指城镇退休年龄以下劳动年龄人口，按照现行退休年龄具体是指男性15-59岁、女性15-54岁人口，随着退休年龄不断延迟，工作年龄的范围也逐渐扩大，当男女的退休年龄均延迟至65岁时，工作年龄人口是指15-64岁人口。根据人口预测结果，当不延迟退休年龄时，城镇工作年龄人口将在2034年左右达到5.5亿的最高峰后下降，2047年下降至5亿以下，2050年约为4.81亿。城镇工作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呈持续下降趋势，从2016年的68%左右一路下滑，2026年下滑至60%以下，2047年下滑至50%以下，到2050年约为47.95%。当按照方案一延迟退休年龄时，可以有效扭转城镇工作年龄人口在后期较快的下降趋势，但保证2050年的城镇工作年龄人口在6亿以上。按照方案1延迟退休年龄时，城镇工作年龄人口在2041年以前将一直保持上升趋势，在2034年左右超过6亿，在2042年达到6.18亿的高峰后开始下降，到2050年约为6.11亿。占城镇总人口的比例也将始终维持在60%以上，2050年约为60.88%。当按照方案2延迟退休年龄时，将进一步拉高城镇工作年龄人口的峰值，城镇工作年龄总量将在2040年达到6.52亿的高峰（见图7）。占城镇总人口的比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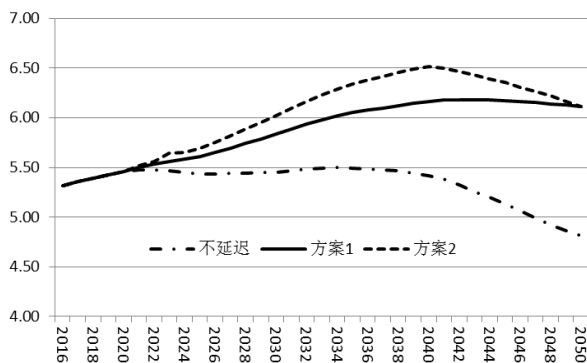


图7 延迟退休年龄对城镇工作年龄人口的影响

在2025年下降至63%左右后有一个明显的回升过程，在2040年达到了65.52%，此后才逐渐下降至2050年的60.88%。

##### （二）延迟退休年龄对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的影响

由于延迟退休年龄将提高各相关年龄的劳动参与率，因此在延迟退休年龄后，将有效增加城镇经济活动人口。根据公式（6）的计算结果可知，在不延迟退休年龄的情况下，城镇经济活动人口将在2022年达到4.44亿的峰值后开始下降，到2050年约为4.11亿。在按照方案1延迟退休年龄时，城镇经济活动人口将在2041年达到4.55亿，高峰时间向后延迟了19年，峰值升高了约0.11亿；在按照方案2延迟退休年龄时，峰值将在2040年达到4.60亿，峰值时间向后延迟了18年，峰值升高了约0.16亿（见图8）。因此，延迟退休年龄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延缓城镇经济活动人口高峰的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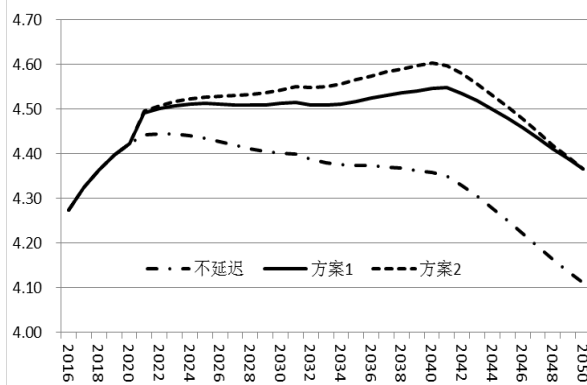


图8 延迟退休年龄对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的影响

资料来源：测算结果。

由于延迟退休年龄只是提高了从旧退休年龄到新退休年龄之间的劳动参与率，因此延迟退休年龄



后城镇经济活动年龄人口的增量大大小于城镇工作年龄人口的增量，也就是说增加的工作年龄人口中只有一部分会真正留在劳动力市场。无论是在方案1还是在方案2下，除退休年龄开始延迟的几年外，每年因延迟退休年龄增加的城镇经济活动人口大体上只相当于因延迟退休年龄增加的城镇工作年龄人口的20%–30%左右。同时，由于退休年龄采取了渐进的方式，因此延迟退休年龄对城镇工作年龄人口和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的影响都是逐渐扩大的，这反映了延迟退休年龄的累积效应。在前期，由于新退休年龄与原退休年龄之间的差距较小，影响的年龄组也较少，随着退休年龄的逐渐延迟，新退休年龄与原退休年龄的差距逐渐扩大，影响的年龄组越来越多，影响的人口规模也就越来越大。在两个方案下，延迟退休年龄时城镇工作年龄人口较不延迟时的增量从开始时的300–400万左右，到2030年的4000–6000万左右，到2050年则将达到1.3亿左右；而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的增量则从开始时的不足百万逐渐增加至2030年的1100–1500万左右，到2050年则进一步增加至2500–2600万左右。

## 五、结 语

当前，中国关于延迟退休年龄的讨论十分激烈。在延迟退休年龄已经势在必行的情况下，仍然有不少声音担心延迟退休年龄对劳动力市场产生较大的冲击。本文按照慢（方案1）、快（方案2）两种方案测算了延迟退休年龄对劳动参与率、工作年龄人口及经济活动人口的影响。测算表明，无论采取哪种方案延迟退休年龄，所涉及的年龄段劳动参与率都将显著上升。当延迟退休完成时，60–64岁男性各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将较不延迟时上升的幅度在14.96–16.50个百分点之间。55–64岁女性各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将较不延迟时上升的幅度在16.33–18.16个百分点之间。同时，延迟退休年龄对增加城镇工作年龄人口和经济活动人口的效应也比较明显。当按照方案1延迟退休年龄时，可以有效扭转城镇工作年龄人口在后期较快的下降趋势，保证2050年的城镇工作年龄人口在6亿以上。当按照方案2延迟退休年龄时，将进一步拉高城镇工作年龄人口的峰值，城镇工作年龄总量将在2040年达到6.5亿左右的高峰。在两个延迟退休年龄方案中，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的峰值将比不延迟高1000多万，且峰值时间推迟了18–19年左右。

当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中国延迟退休年龄开始的时间点可能正好是城镇经济活动人口开始下降的时间点，延迟退休年龄带来的劳动力供给增量刚好是对城镇经济活动人口开始下降的一种补充，同时由于渐进式延迟退休带来的劳动力供给增长是逐渐释放的，因此，延迟退休年龄不会出现劳动力供给总量的大幅增加从而给就业带来压力。根据测算，尽管在两个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下，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的高峰延迟了接近20年，但是两个方案中的城镇经济活动人口都不会出现快速上升，每年城镇经济活动人口较上年的增长率大多低于0.2%，增量大多不超过100万。从这种意义上说，延迟退休年龄恰恰是在城镇劳动力供给即将减少的大背景下，逐渐增加了劳动力供给。实际上，即便延迟退休年龄，在2040–2041年左右，城镇经济活动人口仍然将进入下降通道。到那时，新一轮的退休年龄改革可能又将来临。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描述的只是延迟退休对中国城镇劳动力供给影响的大体趋势。从人口预测的角度说，虽然我们考虑了全面二孩政策对中国未来人口趋势的影响，但实际上这一政策出台的时间还很短，具体的影响还有待观察，同时人口政策也存在进一步放开或是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的可能性，这些都将对以后的人口发展趋势产生影响。此外，本文假定劳动参与率的年龄模式不发生变化，实际上这也会始终处于变化之中。但是，考虑到生育观念的转变和一些国际的经验，即便人口政策进一步放开，生育水平提高的潜力可能仍然有限，同时劳动参与率的年龄模式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本文的研究还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参考文献：

- [1]高庆波,邓汉.关于提高女性劳动者退休年龄的探讨[J].妇女研究论丛,2009,(6):32–37.
- [2]范围.退休年龄比较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1,(5):48–54.
- [3]林宝.中国退休年龄改革的时机和方案选择[J].中国人口科学,2001,(1):25–31.
- [4]林宝.提高退休年龄对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2003,(6):48–52.
- [5]林宝.改革退休年龄需要解释清楚几个问题[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3,(12):70–72.
- [6]林宝.延迟退休年龄对养老金资金平衡的影响[J].财经问题研究,2014,(12):41–46.
- [7]刘妮娜,刘诚.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的影响分析——基于我国29个省份、18个行业的数据分析[J].南方人口,

- 2014, (2):27-35.
- [8]刘琛. 打破悖论: 延迟退休对就业的影响分析[J]. 社会保障研究, 2015, (4):43-49.
- [9]穆怀忠, 柳瑞清. 中国退休年龄延迟方案研究[M]//郑成功主编. 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 (养老保险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1: 385-425.
- [10]杨贞贞, 史文钊, 陈立影, 米红. 法定退休年龄延迟对劳动力市场的挤占效应研究[J]. 第一资源, 2010, (3):144-162.
- [11]OECD. Pensions at a Glance 2013: OECD and G20 Indicators, OECD Publishing[EB/OL]. [http://dx.doi.org/10.1787/pension\\_glance-2013-en](http://dx.doi.org/10.1787/pension_glance-2013-en).
- [12]OECD. OECD Employment and Labour Market Statistics [EB/OL]. [http://www.oecd-ilibrary.org/employment/data/oecd-employment-and-labour-market-statistics\\_lfs-data-en](http://www.oecd-ilibrary.org/employment/data/oecd-employment-and-labour-market-statistics_lfs-data-en).

## The Effect of Postponing Retirement Age on the Labor Supply in China's Cities and Towns

LIN Bao<sup>1,2</sup>

(1.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Center for Aging and Family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It is urgent to postpone the retirement age of employees in China. Based on two plans, this paper calculates the effect of postponing retirement age on the urban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the population of urban working labor force and the economically active urban population. Our study shows that postponing retirement age can effectively raise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and increase the supply of urban labor force. Implementing such a policy enables to postpone the arrival of the peak of China's economically active urban population for 20 years.

**Key words:** Postponing Retirement Age; Supply of Labor Force;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Economically Active Population

[责任编辑: 马瑞雪]

[责任校对: 李 蕾]



# 本期特色栏目作者

## AUTHORS FOR SPECIAL ISSUES



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十二五”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社会职务，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中国国情研究专家和学术带头人。出版《中国道路与中国梦想》《2020 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各类中英文专著、编著 60 余本，学术论文近 500 篇。

（文章内容详见第 7—1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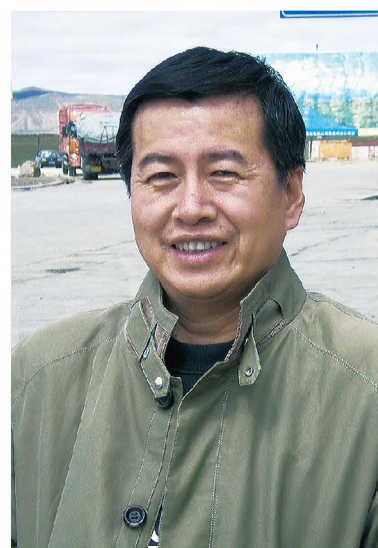
刘志彪，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十二届政协委员、江苏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出版学术专著 40 多部，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 500 多篇。撰写的“咨询报告”获得中央和省部领导肯定性批示近 30 次。论著获得省部级以上政府部门的学术奖励 10 余次。

（文章内容详见第 34—40 页）



李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学科组评议专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课题 6 项；出版专著 4 部，参编著作、主编教材 10 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论文 220 余篇。2017 年入选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高频率转载来源作者名单。

（文章内容详见第 77—86 页）



吴宏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中亚问题研究，著有《中亚安全与稳定研究》等 10 余部，在《人民日报》等报纸和期刊上发表论文 100 余篇。

（文章内容详见第 94—101 页）



林宝，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人口与社会发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与家庭研究中心副主任。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各类项目 10 余项，参与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十三五”时期人口形势和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研究等各类项目 30 余项，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部）。

（文章内容详见第 111—118 页）



朱利奥·托诺尼，著名神经科学家、精神病学家、威斯康星大学睡眠医学教授、意识科学讲座教授，当代意识科学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提出了“整合信息理论”（IIT）。他与杰拉尔德·埃德尔曼（Gerald Edelman，1972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合作撰写的《意识的宇宙：物质如何转变为精神》一书，已译为中文出版。

（文章内容详见第 129—150 页）